

# 曾国藩 近代中国政治与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蒋广学

**内容提要** 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为坐标,给曾国藩的思想做恰当的定位,是本文的基本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助船坚炮利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之时,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畲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反照的机会,而在此反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联系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凡是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无不推崇曾国藩,而一度对曾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民党人,在其执掌政权而面临着巩固统治秩序的任务后,颂扬曾氏的著作便不绝于耳,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关键词** 理学 太平天国运动 中体西用 保守主义

蒋广学,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210093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浩明三卷本小说《曾国藩》出版后,大陆顿时引发了“曾国藩热”。通过电子检索,至 2005 年 5 月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曾国藩的图书目录 1181 条,相比李鸿章 352 条、左宗棠 158 条多了许多;而关于讨论曾国藩的论文,据 CNKI 数据库统计,从 1994 年至 2004 年底,竟达 720 篇次,相对于李鸿章 559 篇次、左宗棠 268 篇次亦多了不少。从我们已经读过的论著看,其观点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真有点像章太炎在《检论》中所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了<sup>①</sup>。话也说过来,尽管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不同,但谁也不能否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影响。而多数作者,都是从曾

国藩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立论的。这便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曾国藩的思想属性和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 一、与魏源、徐继畲相比,“出山”前的曾国藩是一位落伍者

曾国藩(1811—1872 年)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当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28 岁入京赴考,殿试获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以及留京师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37 岁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之时,正值西方列国借着自己的船坚炮利,将其资本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大地的当口:1840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赔款、割地和“五口通商”,同时还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即英人在通商口岸犯罪,只能由英人按英国的法律来裁判。中英《南京条约》以及后续条约的签订,引来了一群“豺狼”,他们争先恐后的来到中国,希望将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43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843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他们像英国人一样在中国享有通商、传教以及“治外法权”,紧接着,虎视眈眈的俄国人也跟了上来,自184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之后,便加强了对中国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占。而在此过程中,步步高升的曾国藩正在京师潜心研治中国的传统之学呢!

据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31岁,师从唐鉴,“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肄力于宋学矣。”道光二十二年(1842)32岁,“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与蒙古倭仁等人,“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34岁,“还书家中,训勉兄弟,以立志有恒为本,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敬,四曰谨言,五曰有恒”。道光二十五年(1845)35岁,“公每以盈满为戒,自名其书舍曰‘求阙斋’。其说云:‘求阙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也’”。道光二十六年(1846)36岁,“公尝谓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对汉、宋分户提出严肃的批评。道光二十八年(1848)38岁,“公官至卿贰,名望渐崇,而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其目三十有三。公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sup>[2]</sup>看来,这十年的学问,乃是倾心于程朱,恪守于礼教。读1941年至1852年曾国藩日记或家书,我们极难找到他关心中外局势的片言只语,进入人们眼帘者多为读书、修身和齐家之类;而查阅1851年5月《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及其之前的六篇奏折,看不出这种二品大员的思想有什么新时代的印迹。《遵议大札疏》言郊祀礼制;《应诏陈言疏》言“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请设坛祈雨疏》言为解大旱之难,“应请敕下各该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祭陈日讲事宜》言“日讲”之事,要“系于赞助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议汰兵疏》讲“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

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议覆李纲从祀文庙疏》,言宋臣李纲,“核其品学经济,实与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当一体从祀,以奖忠义”。被曾国藩自己说得神乎其神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表现出他对广西农民举事起义之敏感:“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其中也有对皇上“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的大胆批评:“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sup>[3]</sup>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背景来看待曾国藩之所学、所言、所为,他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一丝新时代的阳光,真可谓大不识于时务者。

是的,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囿于中国的传统之学、之政、之术而不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事实上,欧洲各主要国家,自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便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英国于1642年发生了议会党人与保王党的内战,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统治,又至1801年建立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这便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加之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其势力向世界各国扩张,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与英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法国,深受英国革命的鼓舞,从1789年革命开始,到1794年由雅各宾派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又至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公布《拿破仑法典》,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下来,也加速了征服世界的步伐。而一直处在分裂和动荡状态的德意志,于1801年组成了德意志联邦,而至威廉一世于1861-1888年在位而由铁血宰相俾斯麦辅政时,便于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1870-1871年大败法国,从而组成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俾斯麦辅政,对于40岁之前的曾国藩来说还是后来的事,但德意志崛起的苗头,早在梅特涅(1777-1859)任首相的奥地利统治德意志时期就显露出来。比起西欧国家相对落后的俄国,自彼得大帝执政后,以1697年“微服私访”英、荷、德为起点,便开始了欧化过程,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内,经过叶卡捷琳娜

二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一世等沙皇的统治，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因而成为直接威胁中国的可恶力量。美国是新近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通过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又经过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因而使国力迅速发展起来，开始进犯日本，继而张望中国。欧美各主要国家一百余年来迅速崛起和步步扩张的事实预示了一种趋势：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作为古老的东方大国，将不可避免的要成为列强们争夺和瓜分的对象了。

而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并未发现40岁之前的曾国藩有何种反映。或许有人认为我们这样评论他有些苛刻。其实不然。同样是湖南籍清朝官员魏源（1794—1851）于1842年依据林则徐《四洲志》以及《澳门日报》的材料，编成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后又补成100卷，于1847年在扬州刊行。该书不仅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大致情况，同时更有强烈的抵御列强的时代目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sup>[4]</sup>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虽然打着“师夷长技”的招牌，但其内容却也涉及到夷“道”：介绍英国时，对于君主立宪政体、国会与政府之关系、选举制度，以及报纸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等均有介绍，如在《英吉利国广述上》中说道：“英国字母最少，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及各著述，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sup>[5]</sup>在谈及俄国时，对其强国之因也有揭示：“人犹雄悍，未谙西洋之艺。及至比达王（今译彼得大帝——作者注）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之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作者注）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法兰西（法兰西）王国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sup>[6]</sup>此同时，在道光十八年（1838）之后一直在闽、粤沿海任职的徐继畲，也以数年之力广泛搜集西人所传的各种资料，编成《瀛寰志略》，并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印。该书在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及风俗文化方面的内容有《海国图志》所不及者，如《海国图志》对于西方议会制以及美国总统选举与任期制度的介绍，虽然给人耳目一新

之感，但是，《瀛寰志略》则进一步以按语的形式评述了西国的总统及政治制度之美好：“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之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赓赓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同。”又有按语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sup>[7]</sup>

以提出“挑战与应战”模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说过：“影响中国现代变革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的重心深埋于中国内部。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于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模式的情性和固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自给自足，相对来说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产生了抵抗力并使它无视这种挑战。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动已在酝酿中，部分由于对与西方接触作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类变革。”<sup>[8]</sup>确切地说，当西方列强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伸进中国的大地之时，中国的士人是有所反应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是一例。然而，这种力量在中国过于微弱。而靠着攻读程朱理学而进身“二品”之官的曾国藩，却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无怪乎当徐继畲将《瀛寰志略》送他批阅时，他竟以“颇张大英夷”评论之<sup>[9]</sup>。相比之下，曾氏不是整整的落后了一个时代吗？如果没有其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让他大显身手，曾国藩注定会成为被历史所忽略的人物。

## 二、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家和卫道者的领军人物

正当魏源、徐继畲可能来领一代之风骚之时，中国的历史却在顿时之间掀起了新的狂风巨澜：多次科场失意的广西秀才洪秀全于1844年组织了拜上帝会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率众在金田村建号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年底攻下永安州，次年6月入湖南，9月逼长沙，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奉旨在乡组团练、建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十年有余，至1864年7月3日“天京”落于其弟曾国荃之手，终于成为“擎国之柱”——“恩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好不荣耀与威

风!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首先看到了:是国内多种矛盾的发展将曾国藩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同时也发现:正是这场长达十多年之久的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给了讲究经世、实用的朱子学一次展示夕阳霞光的机会,而这次展示又因曾国藩所带出的一批儒臣与谋士的参与而有了一些新的内容。

的确,如果没有席卷大半个中国、且又坚持了十多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就不可能有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地位。太平军的起义是由多种矛盾所引起。从根本的矛盾说来,是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载有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的话:“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分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鸦片战争失败而向英人大量赔款、吏治的腐败、大小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的盛行,更加重了社会矛盾。而这种腐败因为鸦片的大量传入更有所加剧。这一情况引起了远在英国的马克思的高度注意,他写道:这种大规模的官员腐败,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他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联系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中唤醒似的。”<sup>[10]</sup>

事实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大规模的“农民革命”一爆发就无法收实。我们关注的是:当曾国藩奉旨组团练、建湘军,誓与太平军进行殊死的阶级大搏斗之时,在他眼界中的“思想武器”是什么呢?明清之际所萌发而乾嘉时期走到全盛阶段的“汉学”,至嘉庆后期就露出衰落的迹象。选择宋学吗?空谈的或作为士人升官垫脚石的“宋学”固然不会选,但由他的老师唐镜如所教导而由桐城诸公所宣扬的“实用”宋学,由于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所以便给予曾国藩“发扬光大”的机会。他起兵伊始,就发《讨粤匪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观众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sup>[11]</sup>。

这份战争宣言,表明了曾国藩坚守名教纲常学说的强硬立场。而随着湘军的扩大和战争在血腥中长期延续,曾国藩将其理学深入到各个方面。

第一,建军要在选将,而“公之选将领,以四科为格: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劳苦。”(《曾国藩年谱》[癸丑]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条)这是录于《始兵语录》首章《将才》中语。《始兵语录》十二章,有“将才”、“用人”、“尚志”、“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多方面的内容,像是一部“政治建军”的教材,但其最重要的,则是“将才”。他说:“古来名将帅,亦多出于文弱书生。功之成与否,虽不敢预必,要之洁清自矢,则众不敢侮,严明驭下,则兵不敢玩,此则有志之士可以勉力为之,立竿见影者也。”<sup>[12]</sup>

第二,治军以爱民为务。曾国藩杀人如麻,有“曾剃头”之称,其生性十分残忍。他曾自我表白,为了灭“匪”,他“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sup>[13]</sup>。他之所以说得如此坦率,是因为在这位理学家看来,起义军民之所以该杀,是因为他们害民残民;如果官军有掠民者,情节严重者亦格杀勿论。从理论上说,他在“匪”与“民”之间既有严格的界限,也有不同的态度。《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说:“凡人之心迹,愈久愈明。果是匪党,虽父兄不能曲护。果非匪党,虽仇人不能栽诬。”这体现了他“于除恶务尽之中,寓生道活人之意。”<sup>[14]</sup>对于一般百姓,《始兵语录》“仁爱”章说:“爱民为治兵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曾国藩曾为湘军制订了种种规定,扎营有营规、行军有行军规。为了安民,他于咸丰八年(1858)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歌词前有一小序,强调官兵没有规矩,民惨于“匪”。其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sup>[15]</sup>真有些

“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味道。

第三,关爱和体恤下士。曾国藩治军很严,凡有私逃回家者,一律“严拿正法”;但他也非常爱护士兵,护兵如父兄。他提倡:“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悻。”<sup>[16]</sup>曾国藩更注意体恤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曾氏奏折中,有大量为“阵亡及殉难文武员弁,请从优议恤”而写的。另外,还有许多祭文、祠记、碑记之类,更表现出他对牺牲将士的怜恤之情。如《林君殉难碑记》:“呜呼,自余倡率楚师转战荆、扬二州之域,其间相从死事者,不可胜道。或贞白无他,誓不相背弃,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裸于当世,爱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sup>[17]</sup>

第四,曾氏本人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同治九年,他去天津处理教案前,他给两个儿子写信,将其人生哲学进行了小结:“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伎不求为重。伎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不能扫除净尽。”<sup>[18]</sup>“不伎”就是不嫉贤妒能,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相对团嫉和亲如一家的领导核心;“不求”就是“大公无私”,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只有这样,才能泛爱众,使天下百姓归而往矣。这可视为对《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义的发挥,要通过内圣来达到外王的目的。当然,能否在事实上做到这一点,即使一时做到了,能否长期坚持下去,这是值得怀疑的,但实行于一人之时,确也有可以考稽的事实。查《曾国藩年谱》,记曾国藩注重自身修养、严以律己的条目很多。咸丰四年四月初三日条下,记湘勇屡溃,曾国藩屡屡要求自裁。“公言:‘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吾以义声倡导,乡人诸君,从我于危亡之地,非有所利也,故于法亦有所难施,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年谱》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条下记:“公寄书家中,名其所居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

由此说来,曾国藩是以理学治军的实践者。湘人自宋代周敦颐起,就种下了理学的传统,在

近世有陶澍、贺长龄、魏源经世派的影响,特别是由罗泽南以及唐鉴在湘设馆授徒,遂成风气。曾国藩乘风而导之、行之,在军中造就了一大批理学信徒。据梁绍辉统计,仅被曾推荐或亲手提拔的都抚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李续宜、杨昌浚、蒋益澧、刘蓉、刘岳昭、彭玉麟、唐训方、郭嵩焘、江忠义、刘坤一、刘典、曾国荃、李兴锐、李宗羲、李瀚章、李鸿章、吴坤修、沈葆楨等三十余人,其他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司道府县之类,数以千计<sup>[19]</sup>。加之湘军的元老罗泽南及其爱生王珍等,则组成一支庞大的理学队伍,他们活动的能量,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支军队不是与外国人较量,而是与因极端的贫穷、落后、无知,但向往平等,跟着一个“宗教集团”起义的农民军作战。农民起义军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其英勇杀敌、顽强作战的精神也是可嘉的。但由于高层的分裂,特别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在一支被理学所武装起来的大军面前,而最终归于失败。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给奄奄一息的理学一次再生的机会。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南京这块废墟上改建“江宁府学”,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曾国藩当仁不让,为此写下了《江宁府学记》,“记”尾曰:“孟子言:‘无礼、无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讲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僻异端而迪吉士。盖稟稟乎企响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彬,鸣盛东南已哉!”曾国藩想的是在全国能让理学光复如初矣。

### 三、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曾国藩取得了对太平天国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奇特的现象。由于对太平军以及稍后对捻军的胜利,国内形势暂时出现了平静,因而曾国藩便成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同治中兴的上下时限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说来,随着曾国藩和文祥的逝世,这个中兴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就在这个“中兴”之时及之后,西方列强却加紧了“征服”中国的步伐。俄国军队加紧蚕食新疆和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英国侵入西藏,法国侵入越南,美国也跟上来趁火打劫,他们妄图以这些周边地区为基地,并在此挑起事端,作为进一步侵犯中国腹地的借口。而对于这一严重形势,曾国藩与他的弟子、下属们虽逐步有所认识,但对于西方列强的挑衅活动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这就是说,他们镇压太平军以及捻军的胜利,既没有改变列强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未

能使中国增长出抵抗列强的国力。与此相反:在此时,受到荷、英、法、俄特别是美国侵犯的日本倒觉醒起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发生影响,而传到日本后,到受到极大的重视,给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运动增添了一种新的动力<sup>[20]</sup>。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所以胜、中国所以败,追究“近因”,盖在于日本人以开放的心怀学习西方的强国之道时,曾国藩们竟把心扉关闭,大搞复兴理学的“运动”。

全面审视曾国藩复兴理学的运动,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保守性。理学本身就是保守的,但曾国藩所复兴的理学则更加保守。朱熹所编的《学章句》,首章就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而,朱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格君”,要君王以己之正来正人。然而,我们通观《曾国藩全集》,极为罕见他有“格君”的思想。能看到的,大概只有咸丰元年(1851)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而充斥全书的,则是如何做个忠臣。曾经有一种传说:王闿运曾动员曾国藩,谓清祚已尽,不如自己起而取代,而曾国藩假作入睡,鼾声大作。今天看,以王闿运之聪明以及他与对曾国藩的了解,此事断难成立。但此事还是被冯友兰写在自己的书中。他说:“曾国藩打下南京后,为什么不乘胜北上,一举而推翻满清呢?”对于这个问题,最明显的答复是,他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思想。<sup>[21]</sup>此可谓确评。

其二,曾国藩所复兴的理学运动具有实用性。程朱理学本来就是“实学”,但他们的实学是通过切实的修身来达到外王的目的。而相比之下,曾国藩更重视“外王”之学问。正像《曾国藩评传》的作者梁绍辉所概括的:“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可概括为如下公式:(1)义理(德行);(2)义理(德行)—经济(政事);(3)义理(德行)—考据(文学);(4)义理(德行)—考据(文学)—辞章(言语)。这个公式表明:“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流乎其中矣。”<sup>[22]</sup>这表明他的“内圣”实际上包含了“外王”。这种理论在以往的理学家(含心学家)是极为罕见的。

任何一种“长久”的政治或学术运动都不会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消声匿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其后的民主主义运动——不论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深受其影响。三者的革命性质不同,但后二者在主张“国体革命”的问题上,基本上沿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张。同时,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

将“天朝田亩制度”发展为“民生主义”,从而给推翻清朝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接受了洪秀全的影响。因而,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革命思潮的重要源头。

曾国藩复兴理学的运动则不然,它是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sup>[23]</sup>。保守并不一定就等于反动,但它却反对革命,只主张社会以渐进的方式发展。曾氏之运动在两个方面影响着后来的历史过程。其一,它直接推动了洋务思潮的发生。曾国藩始涉洋务是出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咸丰十一年(1861)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提出:“购买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sup>[24]</sup>而当他年底看到华蘅芳和徐寿父子试制成第一台蒸汽机后,于当天日记中十分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使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sup>[25]</sup>而当年年初安庆内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小火轮,八月与容闳商办洋务事宜,年底派容赴美购置机器。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洋务之始。由于此口已开,后来随着中外矛盾的凸现,李鸿章、左宗棠们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大办洋务的社会运动。受过曾国藩的影响且做过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sup>[26]</sup>这就是中体西用,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此思想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而洋务运动则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正是由于该运动的发展,中国才有了近代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这是不能否定的。

其二,它间接地推动了康、梁近代改良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像曾国藩们一样,康梁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体革命”,但又与他们不同,要求把改良的范围超出器物的层面而进入“政体”的领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实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既以纲常名教束缚人们的思想,又以西方技术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捍卫纲常名教,这一套用来对付落后的中国民众还可以,但用以对付迅速发展的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则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历史将康有为、梁启超推上了前台。康有为的家族是因镇压太平军的起义而“暴发”的。他11岁随祖父“学于官舍”,“频阅氏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19岁学于岭南理学家朱九江,深受其“济人经世”思想的影响,“于时捧手受教,乃

如旅人之得宿,盲人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必可读尽,以一身为心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其雄心壮志,不可一世;于22岁时来西樵山“养神明,弃渣滓”,“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sup>[27]</sup>。这说明,康有为是学习了曾国藩才产生了佐天之志,又通过曾氏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宋学,在反对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的实践中,才走上了今文学的道路。而到了1895年组织强学会时,他仍不忘表彰曾国藩:“曾文正公开造成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矣。”<sup>[28]</sup>总体上看,康有为所领导的政治改良运动的性质而言,它既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对它的一种继承,与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的革命绝相对立。后来,梁启超在与孙中山的《民报》派进行辩论时,曾多处大批“洪杨”,但他对曾国藩却吹捧有加:“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更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他甚至提出:“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sup>[29]</sup>康、梁对太平军十分敌视,所以,怎能不将曾国藩奉为他们的楷模呢!

其三,有趣的是: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也渗透到一些持保守主义的学者之中。最著名的可算是以故台湾大学教授萧一山了。这位以研究清史(含太平天国运动)而著称的专家,于在上世纪40及60年代相继出版了《曾国藩传》,对曾国藩的救国和治国之道评价甚高:“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民族的立场既要固守,国家的面貌也需改造。他还说:“我们佩服曾文正,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远大的眼光,就因为要救国救民族离不开这种原因,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可以完全证明了。”<sup>[30]</sup>看来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的萧先生认同了曾国藩的保守主义思想;而这种认同,以唐浩明三卷本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便延续到中国大陆。

如此说来,曾国藩不仅是古代中国保守主义的终结者,他同时也是近代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鸣谢:本文得到《曾国藩评传》的作者梁绍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意。)

### 注释

- [1]章太炎:《检论·杂志》,刘凌等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 [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
- [3]以上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
- [4][5][6][20]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333页,第356-357页,第53-58页。
- [7]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第291页。
- [8]〔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 [9]田一平:《瀛寰志略·校点说明》,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115页。
- [11]《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2页。
- [12]《曾国藩全集》第13册《批牍》,第308页。
- [13]《曾国藩全集》第1册《奏稿》,第45页。
- [14][15]《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57页,第473-474页。
- [16][17]《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04页,第257页。
- [18]《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1370页。
- [19]梁绍辉:《曾国藩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94页。
- [22]《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43页。
- [23]〔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24]《曾国藩全集》第3册《奏稿》(三),第1603页。
- [25]《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二),第766页。
- [26]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较邠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98页、第211页。
- [27]《康有为自编年谱》,刘梦溪主编:《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28]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 [2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4,第134页。
- [30]萧一山:《曾国藩传》,第105-106页。

责任编辑:肖波)